

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战略选择^{*}

金 峰 陈 琪 管传靖◎

【内容提要】 海军建设是一个需要兼顾物质基础和力量运用的综合战略与政策行为，崛起国执行怎样的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决定了其海军建设的效果和能否崛起成功。关注物质基础的海军发展战略可分为对称与非对称两个类型，关注力量运用的海军运行战略可分为开放与保守两个类型。两种战略选择组合的类型，直接影响着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效果。以 1889—1918 年的美国为例，崛起国执行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加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其海军建设的效果相对较好。以 1964—1985 年的苏联和 1897—1918 年的德国为例，崛起国执行非对称加开放以及对称加保守的战略选择，其海军建设的效果则相应变差。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对海军建设的影响总是优于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也相较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对海军建设的效果更有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海军建设 海权理论 海军发展战略 海军运行战略

【作者简介】 金 峰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电子邮箱：jf-319@163.com

陈 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电子邮箱：chenqi@mail.tsinghua.edu.cn

管传靖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gcjing@126.com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亚太安全关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5AGJ006）的阶段性成果。

海 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其发展路径和策略选择是学术界和决策者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世界近代史表明，霸权国往往同时拥有稳定的海上霸权，而海上霸权有效支撑了霸权国的全球影响力。相对而言，以崛起为目标的后起国家进行海军建设却是一个风险很高的历程。轻则海军本身发展受挫，如 18 世纪的法国；重则国家崛起进程被打断，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而与历史有些相似的是，目前中国海军正伴随着国家整体的崛起过程一同发展。以 2012 年 9 月首艘航母“辽宁”号正式列装为标志，中国海军开始由近海迈向远洋，进入所谓“蓝水海军”时代。另外，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军也开始引起了当今海上霸权美国的注意和警惕。最近几年，在“重返亚太”战略的驱动之下，美国开始积极寻求在东南亚地区扩充自己的海军存在，其围堵中国海军的意图已日渐显露。中国的海军建设日益面临之前的崛起国同样经历过的战略选择难题。从此困惑出发，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何种重要因素影响了崛起国^①海军建设的效果？怎样的战略选择有助于这类国家的海军崛起成功？

一 既有研究回顾

海洋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国际公共资源，是国家间影响力和力量传导的“良导体”，一国海军战略的调整很容易影响他国的利益，不管其本身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不同战略所存在的差别更多是源于各国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战略目标。因此，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关注各国发展海军的共性因素即地缘因素问题的理论发展；其次，以中国自身为例，分析崛起国发展海军时的战略理论难点和应有的战略目标。

^① 本文中所提到的崛起国，是指自身整体实力已达到洲级规模，海军实力正处在崛起或起飞阶段，有机会且有意愿挑战海上霸权国的陆海复合型强国。根据此定义，以较为宽泛的标准，19 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德国，冷战中后期的苏联皆可被认为属于此列。

（一）关于海军建设中地缘因素的理论争论

在海军建设的路径分析研究中，多数学者首要讨论的是地缘因素对海军建设的影响。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第一次明确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欧亚非大陆成了最大的“世界岛”，美洲和澳大利亚是它的“卫星岛”，而俄国位于大陆中心位置的枢纽区域。“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极难进入，边缘国家往往容易处于弱势地位。^①

但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进步和核武器理论的出现，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有学者就认为，海上作战比陆上作战对科技更有需求，地理决定了海上作战的环境，而科技试图控制这种环境，空间也较陆地广大。^②如果能将武器、设施和地理环境结合起来，便能于战时控制海上的运输。海上作战更容易达到地方力量梯度的边缘地区实施作战，海上运输亦较陆上运输更具优势（在大部分时候）。^③在技术上，核动力潜艇打破了麦金德理论的两个前提：核动力潜艇的出现使水面舰艇占优势的时代基本上过去了，海军迎来了大规模扩张的新时期；海军力量第一次能够到达心脏地带。有学者认为在核武器时代，要对抗“心脏地带”国家的陆军优势，西方国家应该结成新的海洋联盟。^④该理论一个可能的漏洞是，它过于倚重核武器的作用，但核武器原则上是运用于无限战争，在有限战争里其作用并不彰显。因此，从理论上说，崛起国在制定战略时必须考虑陆军和海军的区别。

①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1904, pp. 421 - 437.

② Michael Lindberg and Daniel Todd: 《近岸、近海及远洋舰队：自 1861 年迄今地理环境对海军作战之影响》，高一中译，台北，“国防部”史政翻译室，2005，第 25—28 页。

③ Bernard Brodie, *A Guide to Naval Strategy* (New York: Praeger, 1965), pp. 12 - 25.

④ Robert E. Walters: 《海权与核子谬论》，钱怀源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 年 10 月；吴征宇：《海权、陆权与大战略：地理政治学的大战略内涵》，《欧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52—66 页。其思想源流参考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2), pp. 412 - 416。

部分英法学者还批评麦金德过分夸大了“心脏地带”在国际政治运作中的枢纽作用,忽视了海洋与海洋型国家的地缘优势及其统治世界的潜力。^①在此方面,最系统的论述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20世纪30—40年代所发展出的“边缘地带”理论。所谓“边缘地带”,其实就是麦金德理论中的“内新月地带”。但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德认为这一地带是地缘政治上的从属地方,斯皮克曼认为边缘地带才是最终决定世界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表现为,处在这一地带上的强国既可以自主选择向陆地或者向海上的结盟方向,也有可能遭遇来自两个方向上的夹击。^②有趣的是,本文后面将要论及的美国、德国、苏联以及中国,在斯皮克曼的认知中都属于“边缘地带”国家,因此这一理论流派也值得重视。

在本节中,从笔者对自二战以来的海军理论进行梳理可以看出,技术水平、时代背景和国际规范等诸多因素均可能影响海军建设,关于海军构成和分析海军实力要素的既有研究虽然不甚丰富,但通过考察已有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地缘因素是发挥战略效用的首要要素。

(二) 以中国为例关于海军建设的研究评述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成熟的关于崛起国海军建设的相关研究,但中国正处于权力快速上升的时期,是公认的崛起国,有关中国海军建设的相关文献也层出不穷。因此,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就可以窥见有关崛起国海军建设路径选择的观点。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借用张炜的说法,将各种观点粗略地分为“海军优先论”“反海军优先论”以及“海陆和合论”三类。^③

①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34—36页。

② 吴征宇:《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及其战略含义》,《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第78—83页;刘中民、黎兴亚:《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海权问题研究:从马汉的海权论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7期,第34—45页。

③ 张炜主编《海上国家安全》,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第497—505页。

“海军优先论”的主要观点是，海军是中国通往大国强国之路和遏制美国霸权的必然选择，应该大力发展远洋型强大海军（比如航空母舰）。张文木一方面表示中国目前只能追求有限海权，^① 另一方面又强调是否拥有海权是历史上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要素，中国发展海军的目标是要与美国分享海洋利益。^② 倪乐雄的研究则是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海军压倒陆军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决定海军战略的不是国家地理位置而是对外发展需求，所以中国必须从“内陆农耕国家转向现代海洋国家”，实现文明转型。^③ 另外，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入手，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和海外利益不断增多来证明发展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到了海军在远洋作战、核威慑和夺取制空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④ 也有学者以“战略地缘”概念取代传统的地缘概念，意在说明建设强大海军的动力是源于国家实力增强和海外利益扩展导致的地缘战略环境变化。^⑤

相比“海军优先论”的人多势众，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虽然不多，但也有其鲜明的立场。叶自成等学者从历史经验出发，说明只迷信海上的坚船利炮成就不了海军大国，而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理论也并不适合中国。无论从地缘环境还是战略位置计，中国都不可能成为西方式的海军大国，“海洋空间的发展不可能超越大陆空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⑥ 徐弃郁则从批评经典海权理论入手，认为已有研究过度抬

①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8—14页。

②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第86—94页。

③ 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22—32页；《中国海权战略的当代转型与威慑作用》，《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23—28页；《文明转型与中国海军战略》，引自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第197—204页。

④ 杨震、周云亨：《关于中国海权的几点思考》，《世界地理研究》2012年第9期，第20—27页；与其观点类似的还有周琦、马少猛的《中国海权现状分析及破解海权困境的战略思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第143—147页。

⑤ 方堃：《战略地缘与中国海军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3—48页；李小军：《论海权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国际论坛》2004年第4期，第16—20页；陈彤：《回归地理特性，探讨海权本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51—69页。

⑥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5—17页。

高了海军的历史地位,夸大了海军对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历史进程的联系。所以他主张中国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摒弃这些误区,一方面立足自身的地缘传统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自身安全问题,不在海军问题上做出头鸟。^①

“海陆和合论”走的是中间路线,认为海军和陆军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关系。这一提法最早是由刘江永明确提出的,当时意指“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②之后变成对中国海军战略的研究观点。吴征宇等学者根据中国临近开放性海洋且背对广袤国土的地理环境,提出了建设海陆复合型强国的战略目标。他从战略平衡性的角度论述,认为中国要吸取德国、法国等类型国家海军转型失败的教训,既认识到海军发展的必要性,又明确自身资源统筹。^③胡波则给出了海陆和合论的另一种思路。他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的海陆位置和海洋经济的低水平,决定了中国要比其他国家花费更多精力在协调海陆资源上。而目前中国的海军战略目标不明,利益诉求也不易被国际社会理解。所以中国首先要明确海洋战略的总体目标,在不同的领域运用适合自己实际的手段。在海军建设领域,中国应注意武力威慑与非军事手段的结合使用。^④

(三) 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笔者认为在已有的与海军实力相关的著作文献

①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5—23页。

② 刘江永:《地缘战略需要海陆和合论》,《学习时报》,2006年4月24日,第2版。

③ 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38—50页,孔小惠:《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战略选择》,《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2—17页;王勇:《浅析中国海权发展的若干问题》,《太平洋学报》2010年5月,第90—98页;刘中民:《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5期,第69—78页。

④ 胡波:《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第71—127、247—256页;胡波:《中国海洋战略主打“和”“合”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7月16日,第1版;鞠海龙:《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中，存在以下不足和缺陷。

首先，目前学术界普遍强调地理因素对一国发展海军成败的影响，笔者并非认为这一观点有误，只是认为这样的解释带有很强的宿命论色彩；此外，过于强调地缘因素会导致两个较为严重的后果。第一是对科技的忽略。在航空母舰发明之前，舰队对陆地攻击的能力是受限的，除了从河流进入内陆外，舰队对岸上的威胁受制于舰上火炮的射程。但自“二战”以来，舰队现在已有足够的能力从海岸线数百千米外发动进攻，全然改变了海军和陆军的关系。而且，海军飞机也能摧毁港口和锚泊于内的舰船。第二是对资源和海洋秩序重要性的忽略。在传统的海军理论中，海洋只被用来作为交通之用，然而今天海洋已经变成资源的供应者，大量食物、能源和矿产来自海水和海底。一个国家拥有的海洋领土越大，能拿到的资源越多。所以，保护海洋资源是海军发展的重要目的。从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开始用更多方式方法去利用海洋，所以国家现在需要用新的手段来保卫领海和经济海域。

其次，现有的关于海军的研究多数是关于理论的探讨或深化，或者是关于一国海军战略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极少有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平台上对多国海军发展策略的一般性范式的研究。当然，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海军实力与国家的利益诉求联系紧密，因而特定国家的需求才是推动海军理论和战略研究的主要动力，所以研究内容往往以某国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

最后，学术界关于崛起国海军建设的相关文献不够丰富，相关研究还未形成体系，研究的领域和国家分布较分散。笔者主要选择中国作为崛起国的代表对其海军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一方面是因为此领域文献有一定积累，另一方面也是为本文所提出的新理论做一铺垫。

二 有关崛起国海军建设战略选择的理论模型

单纯用大型水面主力舰作为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远不足以如实反映海

军的真实战斗力。如果海军的实力对比仅根据船只数量就能判断其大小的话,那么西班牙无敌舰队和北洋水师也许就不会遭遇悲惨的失败。使用某一单一标准来对一国海军的实力做出判定并不客观,因为后者是建立在多种因素之上的综合性产物。在现实中,不同等级实力的海军会通过承担不同的任务来达成不同的政策目标。因此影响海军完成任务的因素也可以等同于决定海军实力的因素。进一步讲,海军实力作为一国的权力要素,它是既具有输入性,也具有输出性的。^① 在海军完成任务这一语境下,海军实力实际就包括了支持完成任务本身的输入性能力和支持完成任务后续影响力的输出性能力。

海军实力在输入性和输出性上的综合体现,即通常意义的“海军战略”(Maritime Strategy)。提升一国海军实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行为,即使以最为简化的标准,也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即“需要一支怎样的海军和需要一个怎样的海军战略”。^② 前者涉及舰队结构、军舰组成、武器平台和信息系统的整合乃至人员培训;^③ 后者涉及追求怎样的海权和如何有效利用以海军为主的海上军事力量达成相应政策目标。但由于海军战略是一个宽泛且边界并不明确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海军军备建设也属于海军战略的一部分,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和可能的逻辑争议,本文借鉴核战略研究中的相关理念,引入“海军发展战略”(Naval Development Strategy)和“海军运行战略”(Naval Operational Strategy)这两个地位并列且内涵明显不同的概念来替代海军军备和海军战略。^④

① Richard Harding, *Seapower and Naval Warfare 1650 - 1830*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Press, 1999), pp. 281 - 287; 杰弗里·蒂尔:《21 世纪海权指南》,师小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 24—26 页。

② 杰弗里·蒂尔:《21 世纪海权指南》中文版序言。

③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 - 1812*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892), Vol. 1, p. 102.

④ 相关观点参考孙向丽《中国核战略研究》,引自张沱生、李彬、樊吉社编《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 21—36 页。

自18世纪末，风帆战列舰“阿伽门农”号和“胜利”号相继成为英国传奇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Viscount Nelson）的舰队旗舰以来，海军发展战略，也就是通常而言的造舰计划，对世界各国来说都一直是消耗大量资源的复杂且有挑战性的国家工程。^① 即使从那之后200多年间，世界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技术革新，执行海军发展战略对国家的消耗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对国家的资金、技术乃至整个工业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② 在这一点上，崛起国要提升海军实力还面临着额外的困难。通常一国的海军在执行造舰计划时并不会声明是针对假想敌的。而当崛起国执行造舰计划时，霸权国现有的舰队结构则是绕不开的参照系，这一点甚至与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状态没有直接关系。^③ 对于崛起国来说，霸权国海军既是其潜在的敌手，又是其仿效的榜样。然而，不同的崛起国所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海军发展战略，则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推动与霸权国舰队机构相似的造舰计划，目标是在性能或者数量上取得对霸权国的相对优势^④；第二类是推动与霸权国舰队功能不对称但有针对性的造舰计划，目标是利用新技术规避与霸权国的正面冲突，在侧翼或者消耗中取得相对优势。^⑤ 本文中称前者为对称策略，后者为非对称策略，两者均相较于霸权国海军舰队结构而言。

相比于海军发展战略或者造舰计划这一类相对单纯的涵义而言，海军

① N. A. M. Rodger, *The Western World: An Anatomy of Georgian Navy* (London: Collins, 1986), p. 29.

② Captain James Goldrick, “The Medium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Naval Review*, April 2001, p. 103; C. V. Bett, “Development in warship Design and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of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Vol. 210, 1996.

③ 比如，在19世纪末，尽管缺乏英国执行敌视德意志帝国政策的政策，当时德国的海军部长提尔皮茨依然不能忍受英国海军在制海权上的绝对优势，进而在1898年和1900年连续向德皇提出大规模的战列舰造舰计划。可参见 Paul M. Kennedy,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Naval Operations Plans against England 1896 - 1914,” in *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 - 1914*, Paul M. Kennedy ed. (Boston: Unwin Hyman, 1979), p. 171; Paul G. Halpern, *A 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Annapolis, M. 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pp. 2 - 12.

④ Alfred von Tirpitz, *My Memoirs*, Vol. 1 (New York: Dodd, Mead, 1919), pp. 170 - 177.

⑤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钟飞腾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80—82页。

运行战略^①的涵义就拥有更多的解释空间,甚至连这个概念是否成立都曾存在过一些争议。^②当然,本文并无意讨论海军战略是否存在、海军战略是否重要等形而上的问题,^③笔者关心的是狭义化的海军战略,即本文中的海军运行战略在海军实力提升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及影响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尽管研究海军行为和运行方式的著作早在 16 世纪的风帆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 19 世纪末,海军战略才作为战略学的分支之一开始与作战力量的发展直接相联系。^④该领域的学者就一再声称海军战略至少在两个方面拥有区别于其他军事战略的独特性:一是海洋环境本身的特殊,这造成了海军的机动空间广阔、战线概念模糊、联合指挥与协同作战难度大、威胁来源立体多元等一系列实战问题;^⑤二是海军战略对非军事因素的关注,马汉就曾提到,“(海军战略)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状态,其最终目的是发现、支持并增加一个国家的海权”。^⑥而与其他种类军事战略一样的是,海军的运行战略不仅需要分配军事资源,还需要分配非军事资源,更需要对舰船的使用与战术运用加以限制。所以,海军运行战略一方面与国家战略与政策目标相连接,另一方面为具有特殊性的海军行为提供指导。如果将海军发展战略比作剑锋,那么海军运行战略就是剑柄,其对一国海军实力提升的作用可谓不言而喻。

考虑到本文之后的案例比较所涉及的年代跨度和技术水平差异都很

① 在中国官方的军事教材中,海军战略的定义为:“指在服从国家军事战略的前提下,为达成某一特定目的,而对海军力量的建设和运用所进行的全局性的筹划和指导。”全金富编《海军战略学》,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2001,第26页。

② Thomas Hardy, *The Trumpet Major* (London: Macmillan, 1925), p. 354; Andrew Gordon, *The Rules of the Game: Jutland and British Naval Command* (London: John Murray, 1996).

③ Mark Russel Shulman, *Nav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Sea Power 1882 - 1893* (Annapolis, M. 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pp. 78, 121.

④ Milan Vego, *Operational Warfare at Sea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

⑤ Brian Lavery, *Nelson and the Nile: The Naval War Against Bonaparte 1798*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1998), p. 168.

⑥ Capt.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 1890), pp. 22 - 23.

大，也考虑到几个海军霸权国在制定自身海军运行战略时的变化趋势，本文对崛起国海军运行战略类型的划分既不拘泥于战略理论观点的差异，也不纠结于个别概念的变迁，而是关注一国海军对获得与利用制海权的基本立场，再根据这种立场考察相关的战略选项。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崛起国海军运行战略分为开放与保守两个类型（此处“开放”与“保守”皆为中性词语，不表示笔者的主观立场）。前者是指海军运行战略主要体现进攻性色彩，更强调“介入”^①的战略逻辑和运行范围，更追求在全球开放式的海洋范围内获取安全的海上战略通道；后者是指海军运行战略主要体现防御性色彩，更强调“拒止”的战略逻辑和运行范围，更追求在一定区域（通常为本国近海）的海洋范围内获得排他性较强的安全空间。

综上所述，提升海军实力的相关建设，是指在一个国家提升海军实力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海军发展战略与海军运行战略的制定与转型这两项主要任务。如图1所示，本文的自变量有两个，分别是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两者都属于广义的海军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变量为崛起国海军建设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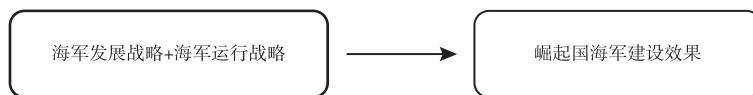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示意

其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具体内涵如下。

第一，海军发展战略是指一国对其海军物质力量、技术水平的发展方向与建设计划的全局性筹划和指导。它由造舰计划的基本结构与海军建设

^① 有关“介入”与“拒止”两种战略逻辑的比较讨论案例，可参考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 A.: RAND, 2007), p. 11;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第8—15页。

的国内基础两个要素所组成，并可分为对称与非对称两个评估类型。

(1) 崛起国造舰计划的基本结构，即造舰的重点舰种和舰队组成与海上霸权国现有海军力量的相似度越高，则判定其海军发展战略越接近对称的类型；崛起国造舰计划的基本结构与海上霸权国现有海军力量的相似度越低，则判定其海军发展战略越接近非对称的类型。(2) 崛起国海军建设的国内基础，即民意和领导层意志对海军建设和海上扩张的支持度越高，则判定其海军发展战略越接近对称的类型；崛起国民意和领导层意志对海军建设和海上扩张的支持度越低或者极不稳定，则判定其海军发展战略越接近非对称的类型。

第二，海军运行战略是指一国对其已有海军力量的调动、部署，以及基于不同政策目标具体运用的全局性筹划和指导。它由战略逻辑与运行范围、对制海权的利用方式和海军实力的对外展示三个要素所组成，并可分为开放与保守两个评估类型。(1) 崛起国越偏重“介入”式的战略逻辑，并倾向将海军力量跨海域甚至全球性地进行部署，则判定其海军运行战略越接近开放的类型；崛起国越偏重“拒止”式的战略逻辑，并倾向将海军力量在一定海域内或本国近海范围内进行部署，则判定其海军运行战略越接近保守的类型。(2) 崛起国海军对制海权的利用越偏重建设性，即注重本国海上航路的保护和开拓，并积极寻求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则判定其海军运行战略越接近开放的类型；崛起国对制海权的利用越偏重破坏性，即注重阻断和干扰他国特别是海上霸权国的海上航路，并且不积极寻求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则判定其海军运行战略越接近保守的类型。(3) 崛起国越积极地以多种形式对外展示本国海军实力，并利用海军作为非战争工具来达成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则判定其海军运行战略越接近开放的类型；崛起国越消极地不愿意对外展示本国海军实力，或越少利用海军作为非战争工具，则判定其海军运行战略越接近保守的类型。

第三，海军建设效果是指崛起国海军在其崛起阶段中的力量变化及最终建设结果。从总体上来看，最优的结果是指崛起国的海军在相对和平的

状态下渡过崛起阶段，自身实力显著提升，具备了进一步赶上或超过现有海上霸权国海军的坚实基础；最差的结果是指崛起国的海军建设在崛起阶段内遭遇海上霸权国的坚决制衡并引发体系战争，崛起国海军在输掉战争后实力被严重压缩，丧失海军强国的资格。

本文将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最优效果称为该国海军实力的“崛起成功”（后文简称为“崛起成功”），将最差效果称为该国海军实力的“崛起失败”（后文简称“崛起失败”），靠近最优一端的效果称为“相对成功”，靠近最差一端的效果称为“相对失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崛起成功”并非指国家整体崛起进程的成功，而是指该国海军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相较于其海军建设崛起期开始之前提升迅速且幅度显著，并且对国家整体崛起进程有明显且实质的正面影响。反之，本文中的“崛起失败”是指该国海军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相较于其海军建设崛起期开始之前提升缓慢且幅度并不显著，并且对国家整体崛起进程有明显且实质的负面影响。另外，海军建设效果的具体评估标准则包括海军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力量投送与海上运输方面的能力、经济技术因素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海军建设对其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及后果四个方面。

本文认为，海军发展战略与海军运行战略两大因素，共同决定了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效果，即崛起国快速提升海军实力的努力能否获得持续性的成功。如果崛起国选择适当的海军发展战略加海军运行战略的策略组合，则其海军在崛起阶段的建设过程将受到来自霸权国及周边国家相对较小的制衡压力，进而在相对顺利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效果；如果崛起国选择不适当的海军发展战略与海军运行战略的策略组合，则其海军相应的努力将遭遇相对较大的制衡压力，自身安全环境恶化，海军建设效果较差，甚至会遭遇失败。另外，海军发展战略与海军运行战略在此过程中并非并列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串联”关系，并且两者各自独立，不能相互替代。以下为本文的理论模型（详见表1）。

表 1 本文理论模型示意

崛起国 海军建设效果		海军发展战略策略选择	
		非对称	对称
海军运行战略 策略选择	保守	海军崛起失败	相对失败
	开放	相对成功	海军崛起成功

由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 1：当崛起国执行一定的海军发展战略时，选择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选项的海军建设效果要优于选择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可以使崛起国海军具更大可能崛起成功。

假设 2：当崛起国执行一定的海军运行战略时，选择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选项的海军建设效果要优于选择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可以使崛起国海军具更大可能崛起成功。

假设 3：根据前两个假设，当崛起国执行开放加对称的战略组合时，海军建设效果最好；当崛起国执行保守加非对称的战略组合时，效果最差；而开放加非对称或者保守加对称的战略组合所导致的崛起国海军建设效果可能居于中间。

三 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案例研究

本节将通过描述现代海军时代不同的崛起国试图挑战海上霸权国而发展海军力量的大体过程，以验证上文提出的战略选择影响这些国家海军建设效果的理论模型。因此笔者选取了 1889—1918 年美国、1897—1918 年德国以及 1964—1985 年苏联这三个不同的案例，来对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的策略选择和海军建设效果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检验。^① 篇幅

^① 其中美国案例和德国案例对应检验假设 1，美国案例和苏联案例对应检验假设 2，三个案例共同对应检验假设 3。而由于现代海军时代缺乏崛起国采取非对称加保守的海军战略选择的实际案例，因此假设 3 在本文中无法得到全面检验。

所限,本文仅就三个案例中涉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要点加以分析,更多的历史细节就不加以呈现了。

(一) 1889—1918 年美国的海军建设

美国海军崛起阶段的建设以 1889 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的特雷西 (Benjamin F. Tracy) 首次向国会提出进攻性海军战略为开端^①,以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为节点。而从上文论述可知,一国崛起阶段的海军建设具有双重属性,需要进行海军发展战略与海军运行战略的转型这两项主要任务。所以,要正确检验一国海军建设的效果,首先要确定一国在以上两个方面执行了何种战略选择。在对本文几个案例的研究中,笔者都将遵循这样的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考察美国在这轮海军建设中所执行的战略选择。

在造舰计划的结构方面,1889—1918 年,当时的海上霸权英国皇家海军正处于费希尔时代。在此阶段,英国具有稳健威慑特征的古典海权时代接近终结,但工业化与技术水平却日臻完善。^②在这 30 年中,现代海军从前无畏舰时代过渡至无畏舰盛行的时代,而英国不论是前无畏舰还是无畏舰,在数量上每年都稳居世界第一。^③1889 年旨在执行“两强标准”的《海军防务法案》^④和 1905 年之后达到高潮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都显示英国一直别无选择地在坚持以战列舰为主体的造舰计划。而回顾美国海军的军备扩充过程可知,从 1889 年特雷西的《年度报告》到一战过程中的《1916 海军法案》,从“印第安纳”号前无畏舰到“马里兰”号超

^① Benjamin F. Tracy,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for 1889* (Washington D. C. : GPO, 1889), p. 4. 转引自 George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The U. S. Navy, 1890 - 199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 - 9。

^② 相关论述参考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 166—179、193—236 页。

^③ George Modelski,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 - 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 76 - 78.

^④ 相关评价参见 Lawrence Sondhaus, *Naval Warfare, 1815 - 1914*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61 - 168。

无畏舰,美国海军对战列舰的注重始终如一。由此可知,1889—1918 年的美国海军建设执行的是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

1889 年前后的美国在结束南北战争后国力迅速上升,政府和民众逐渐偏离建国之初孤立主义的传统,开始转向扩张主义。具体到海军方面,尽管国会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比较保守,但因为有罗斯福和马汉这样极具煽动力人物的存在,政府还是成功地为海军扩军争取到了资源。另外,美国海军中的“少壮派”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自发地展开了一场对民众的海权教育运动,逐渐扭转了南北战争以来民众对海军缺乏好感的局面。^①而美国媒体在美西战争前极具煽动力的“黄色新闻”宣传攻势也起到了作用,民众在战争胜利后对以杜威为代表的海军将领产生了英雄式的崇拜。^②这标志着美国海军建设开始获得大部分国内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的海军发展战略,拥有基于外向型战略文化和民众普遍支持的国内基础。

而在海军运行战略选择上,1889—1918 年,美国基本遵循了马汉的进攻性战略逻辑。在 1898 年的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海军两面出击,先是派遣太平洋中队突袭菲律宾,有效地牵制了从西班牙本土出发的支援舰队;之后利用战列舰集群的火力优势,成功地封锁了远道而来的西班牙支援舰队,并最终将其歼灭。在战争中期的 6 月下旬,美国凭借海军在加勒比海区域所建立的相对稳定的制海权,成功投送了超过 1.7 万名陆军士兵登陆古巴,进而在 7 月 1 日取得了圣胡安高地战斗的胜利,在地面战场实现了对西班牙军队的压制。^③另一个例子就是一战期间美国海军将超过百万的陆军运送到大西洋对岸的欧洲战场。虽然其中占总量 49% 的士兵和相当一部分给养的运输是靠英国船只完成的,但美国海军参与的这些陆海

① 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安纳波利斯的黄金时代及现代美国海军至上主义的出现》,王培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第 275—329 页。

② 毛婷婷:《舆论造势与社会控制:以美西战争为例论黄色新闻的煽动作用》,《新闻世界》2011 年第 5 期,第 146—147 页。

③ 詹姆斯·柯比、兰迪·罗伯茨等:《美国史》,范道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 873—875 页。

共同行动，还是对一战最终的结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 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海军的战略，基本遵循“介入”式的战略逻辑和跨海域的运行范围。

在 1889 年之前，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在海上航行的美国商船，使其免遭海盗和其他国家的袭扰。在海军建设的开始阶段，美国就确立了不能将濒海地带作为战场前线的方针，海军应“保证其行动的一切自由”。^② 在一战期间，美国驱逐舰队跟随英国海军在 1917—1918 年完成了对大西洋商船队的护航任务，帮助欧洲的协约国重新疏通了海上交通线。需要说明的是，在门罗主义原则之下，美国要求对西半球海域的相对控制，同时也享受了在英国海军庇护下的其他海域自由通行权。随着现代海军时代的到来，美国也像其他海军国家一样积极寻求海外基地与加油站，以保障其舰队的续航力。截至一战之前，美国在加勒比海区域的古巴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都建立了基地，保障了其海军在拉美地区的航行能力。而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和萨摩亚的港口，也使得美国海军至少在太平洋东部的调动不至于受到其他国家的制约。此外，美国在此期间所控制的关岛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也开始逐步具备了建设海军基地的条件。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的海军运行战略对制海权的利用具有建设性意义。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欧洲海军强国实施炮舰政策的高峰期，逐渐成长起来的美国海军也没有缺席这一过程。特别是在门罗主义的大旗之下，美国海军在 1889 年后的 30 年中几十次出兵拉丁美洲，将很多小国纳为保护国，彻底将这一地区变成了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成功策动了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从而控制了巴拿马运河这条几乎决定了 20 世纪美国国运和海军发展大势的生命线，而且还通过“巴尔的摩”号事件成功敲打

^① William J. Wilgus, *Transporting the A. E. F.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149–241.

^② Graham A. Cosmas, *An Army for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1), pp. 38–39; George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The U. S. Navy, 1890–1990* (S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21.

了南美洲海军强国智利。^① 美国海军在此期间对外展示实力的行为并不只有强制这一种性质,它在 1903 年委内瑞拉危机中强硬对抗欧洲列强,某种程度充当了美洲国家的利益代言人角色。起到类似效果的还有 1907 年“大白色舰队”的环球航行,这次规模宏大的海军外交行动,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相信美国能够帮助它们抵御来自日本的海上威胁。^② 这些某种程度兼具善意和炫耀性质的海军外交行为,反过来也巩固了罗斯福修正后的门罗主义政策。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海军的战略是主张对外进行高频度与多形式的海军对外展示实力的行为,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接着考察基于以上战略选择的美国海军建设的具体效果。

第一,从崛起国海军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看,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大幅削减了海军预算,造成已有军舰年久失修和海军实力的严重下降。在时任海军部长亨特的 1881 年《年度报告》中就曾提到,美国当时的 140 艘军舰中,仅有 31 艘具有实际战斗力。而在同年举行的海上阅兵式中,竟然还有 1812 年战争时遗留的老式木质战舰。^③ 在 1889 年美国海军建设开始时,其舰队中没有一艘现代战列舰,而此时欧洲国家已进入前无畏时代将近十年。美国海军当时的相对实力只与中国相当,与任何一个欧洲列强都无法相提并论。经过 30 年从无到有的发展,美国海军在一战前的 1912 年已经拥有 22 艘前无畏舰,是同时期英国前无畏舰舰队规模的 53.6%;美国海军在一战结束后,至 1918 年时已经拥有 17 艘无畏舰,是同时期英国无畏舰舰队规模的 38.6%,其超无畏舰的战力水平与英国的相当。此外,美国海军在仿效英国的造舰计划的同时,从 20 世纪初开始相继在潜

① 詹姆斯·柯比、兰迪·罗伯茨等:《美国史》,第 861—862 页。

② M. J. Crawford, *The World Cruise of the Great White Fleet: Honoring 100 Years of Global Partnerships and Security*, (Washington: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 S. Navy, Navy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 2008), pp. 6-7, 108-110; 白永明、张明峰:《美国海军“大白色舰队”的环球航行》,《军事历史》2008 年第 4 期,第 76—78 页;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宫齐等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第 748—749 页。

③ Peter Karsten, *Naval Aristocracy: The Golden Age of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 (Annapolis, M. 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pp. 280-286.

艇、驱逐舰和早期航空母舰的研发上取得了技术突破，为未来引领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打下了基础。^① 因此，美国海军在硬件设备改善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提升巨大，其建设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从崛起国海军在力量投送与海上运输方面的能力看：事实上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海军远距离执行任务的经验就已经相对丰富。经过大规模扩充舰队之后，其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美西战争时期，美国海军可以安全地将超过 1 万人的军队与辎重投送至加勒比邻近海域的古巴参与地面战斗。罗斯福总统执政前后，海军多次将小股美军投送到拉美国家执行保护侨民和武力威吓的行动。而在一战期间，海军除了将数十万美军远距离投送至欧洲战场外，还成功防御了德国潜艇的海上袭扰。在此过程中，参与投送和运输任务的船只，从早期的以巡洋舰为主，变为后期的战列舰、巡洋舰等多舰种联合行动。因此，美国海军在此期间逐步达到了多舰种、远距离、执行多种任务的标准，其建设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从崛起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看，从 19 世纪中后期到 20 世纪初，美国经济一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助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以 1900 年英国的水平为基准 100 计，1900 年时美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 69，相对总工业潜力为 127.8；到了 1913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飙升到 126 和 289.1。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钢产量方面，美国在 1900 年就已经是英国的 2 倍多了。^② 反观海军预算，英国 1900 年为 3400 万英镑，美国只有 1400 万英镑；到了 1913 年，英国已经升至近 5000 万英镑，美国则是 2700 万英镑。^③ 以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实际发展的海军规模并没有对整体经济产生压力，相反还绰绰有余。由于

① 詹姆斯·M. 莫里斯：《美国海军史》，靳绮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 91—94 页；切斯特·赫恩：《美国战史·海军》，胡升新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第 59—61 页。

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 192—195 页。

③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 - 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 80 - 82.

造舰计划和日常维护是一项复杂的大型工程,看到商机的军工、造船和能源行业的托拉斯巨头均毫不吝惜自己对海军的支持。^①而在技术转化和革新领域,美国的步伐并不慢于英国或德国,甚至有时还会显得有些激进。美国是当时海军强国中唯一几乎在所有主要军舰品项研发中都获得成果的国家,例如连续瞄准技术、铜线缠绕鱼雷、早期航空母舰都是明确的例子。因此美国海军建设能够与当时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应,并可以及时进行技术转化——尽管有些技术革新显得并不成熟。^②但从总体上来说,所取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第四,从崛起国海军建设对其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看,从总体上说,1889—1918 年美国海军的实力建设,就是美国海军从世界排名前十的孙山之外赶超至世界三甲的故事。在实施了近一个世纪的门罗主义政策底下,再加上周边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海军实力不值一提,相对有实力的智利、阿根廷海军又很快被超越,所以美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基本上没有因为其发展海军而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在与其他海军强国的较量中,美国先是击败了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西班牙;虽然与德国展开过海军军备竞赛,但是也通过外交手段与之保持了冷淡和平的关系,没有让萨摩亚或委内瑞拉成为战争导火索。最后,美国几乎从未试图超越英国海军,而只是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在世界第二,也没有将舰队频繁派往欧洲海域,因此英国也没有对其采取过明确的制衡行为。所以,美国在进行海军建设的同时,基本保持了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1889—1918 年美国的海军发展战略与两个对称型基本特征比较相符,海军运行战略与三个开放型基本特征相符程度比较高。因此可知,在此期间,美国海军建设的战略选择为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而在海军建设效果的检验中,除了技术进步因素部分不

① 乔治·贝尔:《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 年的美国海军》,吴征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 13 页。

② 海军的技术进步并非追求新近越好,而要求在成熟技术和创新措施之间取得平衡。相关论述参见杰弗里·蒂尔《21 世纪海权指南》,第 175—177 页。

符之外，1889—1918年美国海军建设符合有关海军建设效果评估四个标准的正面描述。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美国海军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顺利通过了自己实力的快速崛起阶段，崛起成功。

（二）1897—1918年德国的海军建设

德国海军崛起阶段的建设以1897年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出任帝国海军大臣并开始研拟新《海军法案》为开端，以1918年德国一战战败为节点。首先考察德国在这一轮海军建设中所执行的战略选择。

在造舰计划的基本结构方面，由于德国海军在19世纪后期经历过卡普里维主政时期大量修建雷击舰，走所谓“绿水海军”路线的混乱时期，海军总吨位从一度的欧洲第三退到欧洲第六。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提尔皮茨上台之后，在《海军第九号备忘录》中明确了战列舰优先的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坚定地延续到了一战之前。由于德国在20世纪初之后陷入了与英国的战列舰造舰竞赛之中。因此这段时间德国海军的造舰计划不仅紧扣战列舰这一主题，就连战舰的形制和体量大小都要同英国海军针锋相对。并且，因为战列舰的修建占据了德国海军绝大部分的资源 and 精力，客观上也导致德国海军战前在其他舰种的修建上特别是潜艇的修建上准备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德国在一战海上战场的相对劣势。由此可知，1897—1918年德国的海军建设执行的是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战略文化的基础，是以普鲁士军事传统为主轴的军国主义和具有扩张性的大国沙文主义。由于德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改革主导权长期掌握在容克地主阶层，因此不可避免地军队建设上呈现出重陆轻海的倾向。^①再加上德国在地理上不直接面对大洋，从事海洋事业的人群本非社会的主流，海军自建立伊始就持续受到

^① 钱乘旦：《谈现代化过程中领导者力量的错位：以德国为例》，《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35—43页；吴友法：《关于对德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293—302页；王明芳：《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兰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36—38页。

陆军传统的影响,提尔皮茨之前数任海军部长都来自陆军就是明证。而在他们的理念中,海军就是保卫海岸和殖民地的防御性力量。尽管威廉二世本人对发展海军很有兴趣,并得到了提尔皮茨的有力辅佐,但是这个时期德国军事战略的重点还是应对来自法国、俄国的陆上威胁,海军建设则起辅助性的作用。这一点从德国的军费支出结构就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在德国海军建设的过程,又没有如美西战争那样足以激起国人崇拜海军情绪的案例,所以德国海军得到的国内支持事实上是比较有限的。由此可知,这一阶段德国海军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德皇的个人兴趣和海军内部的鼓吹,民众和社会精英的兴趣则相对有限,这种情况符合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的相关特征。

1897—1918 年德国海军所执行的战略逻辑和运行范围,基本上是依循提尔皮茨个人极富进攻色彩的战略构想。他在《海军第九号备忘录》中的核心理念就认为,海军作战必须以战略上的攻势作为基础,才有可能达到防御本土的目的。此备忘录提出时,德国海军的假想敌还是法国的北大西洋舰队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所以提尔皮茨还强调了执行进攻性战略时需要建立主力舰数量的优势。但随着 20 世纪初英德之间的竞争态势逐渐明朗,而在当时英国的海上霸权优势又看似无法撼动,这就迫使提尔皮茨的战略思想转向“风险理论”。相对于《海军第九号备忘录》中对攻势战略不遗余力地追求,“风险理论”中已经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防御目的。尽管在 1900 年的海军法中,德国海军依然宣称需要强大的舰队来保卫海外殖民地,但同时又要用这支舰队来达到对海上霸权的威慑作用。实际上,一支舰队是不可能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很明显后者才是这一时期德国海军的真正目的。^①而且,之后英国相继与法、俄两国达成了联盟协议,使得英国舰队可以心无旁骛地集中在北海以对抗德国海军。这样的变化,也迫使提尔皮茨进一步在“风险理论”中加入了

① 王曾惠:《从一个致命的政策“风险理论”看当前“国军”战略思想》,《国防政策评论》2002 年第 2 期,第 144—146 页; Keith Bird, “The Tirpitz Legacy: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German Sea Powe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9, No. 3, Jul., 2005, pp. 821—825。

“存在舰队”的思想，并设想迫使英国与自己进行舰队决战的可能性。之后的战争实践显示，提尔皮茨忽视了英国的地理优势和海军对远程封锁战术的擅长，使得德国战列舰基本无法执行进攻任务，只能坐困本港行存在舰队之实。^①由此可知，德国这一阶段的海军运行战略，在理论层面是进攻性的“介入”思维，但在实践中更偏向“拒止”式的战略逻辑和区域性的运行范围。

在对制海权争取和运用的问题上，德国海军的态度是相对比较模糊的。虽然提尔皮茨早期的海军战略提到要保护德国的海外贸易，争取全球性的海上霸权，并且德国海军也一直保有长年驻扎海外殖民地的巡洋舰队，但由于当时德国海军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和俄国，因此其对制海权的欲望基本只限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狭长区域。其对海上交通线实际的保护，大部分要附属于英国所建立的海上秩序之下，就能力而言，对比同一时期的美国也有差距。德国虽然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些如萨摩亚和青岛这样的海外军事基地，但它们距离德国本土的距离过于遥远，在战时很容易被更加强大的英国海军分割包围，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在一战之中，由于德国大型水面舰艇全部被英国海军封锁无法进入大洋，德国海军只能派遣规模并不大的潜艇部队进入大西洋、印度洋和东南太平洋执行无限制潜艇战，试图阻断英、法等国的海上运输线。基于这些史实可以判定，在现实的压力下，这一阶段德国的海军运行战略，对于制海权的利用注重破坏性意义。

在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海军外交往往与处理殖民地和附属国事务紧密相连。由于德国在1871年才正式完成统一，因此它加入争夺殖民地的时间很晚，相应的收获也有限。尽管如此，德国海军也在试图开展一些基于炮舰政策的对外展示实力行动，攫取一定的利益，比如委内瑞拉危机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但是德国海军在这些事件里的态度都不甚坚决，也没

^① Herbert Rosinski:《海军思想的发展》，台北，“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第100—102页。

有派出主力舰船参与威慑行动,其结果也多是以退让妥协收场。至于德国海军所参加的一些欧洲国家的联合海上阅兵,多是出于礼节,对推动和改善双边关系意义不大。而在战争期间,德国海军与其盟国奥匈帝国及土耳其海军的合作也并不顺利,无法达到牵制英国海军的目标。奥匈帝国一直是欧洲列强中海军实力最弱的国家,在战争中其主要任务是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中部牵制意大利海军和法国海军的地中海舰队,并制造少量的潜艇在形式上支援德国的潜艇战。^①而土耳其海军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则更加孱弱,基本被协约国军队压制在土耳其海峡附近,在战争中的作用着实有限。^②由此可知,这一阶段德国的海军运行战略,虽基本认同对外展示实力和海军外交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投入不足,收效有限,更偏向保守型海军运行战略的特征。

接着我们可以考察基于以上战略选择的德国海军建设的具体效果。

第一,从崛起国海军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看:在 1897 年前,德国海军的战列舰建造虽然已经开始起步,但进展相对缓慢。1896 年时德国海军只拥有 4 艘设计相对落后的前无畏舰,不仅与英国海军同期 21 艘前无畏舰的保有量相距甚远,也落后于法国和俄国等欧洲大陆列强。再加上德国海军曾在 19 世纪 80 年代经历过追求“绿水海军”战略的弯路,将本就不多的资源大多投入到修建设有远洋作战能力的雷击舰上,所以其海军的总吨位一直在欧洲第四至第五位间徘徊,不足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在 1897 年提尔皮茨上台之后,德国的大规模造舰计划就以很快的速度收到了成效。到了 1903 年,德国海军中服役的前无畏舰数量已经达到了 1897 年时的 3 倍,并在之后的几年里稳定在英国海军前无畏舰数量的一半左右。^③如果说,德国在前无畏舰建造上起步较慢所以较难追上英国的话,那么在

① Robert Gardiner ed., *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906 - 1921* (Annapolis, M. 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pp. 339 - 342.

② Tuncay Zorlu, *Innovation and Empire in Turkey: Sultan Selim III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Ottoman Navy*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p. 221 - 268.

③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 - 1993* (Seattle: 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 75 - 77, 304 - 310.

基本是同时起步的无畏舰建造上德国则又拉近了与英国的距离。从 1912 年开始到一战结束前的 1917 年，德国海军中服役的无畏舰数量始终保持在英国的 2/3 左右，总吨位也在一战之前达到了世界第二。^① 如果再考虑到英国为了维持其海外霸权必须将部分主力舰派遣到其他海域部署的话，德、英在北海的海军实力对比在数值上已经趋于均势。因此德国海军在硬件设备改善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明显提升，其实力建设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从崛起国海军在力量投送与海上运输方面的能力看：一战前，德国在几次炮舰外交的行动中曾经执行过小规模的力量投送行动。而在一战期间，德国海军在此方面的表现近乎一无是处。一是公海舰队从未对英国本土的港口造成过实质性的威胁，二是德国也从未发动过像样的登陆作战行动。在战争前期，甚至出现过“戈本”号（SMS Goeben）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思劳”号（SMS Breslau）巡洋舰在地中海为躲避英、法海军的追击逃至土耳其，而且德国认为两舰返航无望，索性就将两舰送给土耳其的案例。^② 德国海军在二战前后鲜有大规模海上运输的行动，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战争的重点在陆上，但德国海军本身能力的缺失也难辞其咎。因此，德国海军在此阶段的投送能力仅达到了投送范围狭窄、投送规模小、持续时间短的标准，其实力建设获得的效果相对较差。

第三，从崛起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统一红利的双重刺激之下，德国的综合国力在普法战争后提升的速度很快。在海军建设刚开始不久的 1900 年，德国 630 万吨的钢铁年产量就已经超过了英国的 500 万吨，而到了一战开始前的 1913 年，德国的总工业潜力和制造业份额也都反超了英国。从国家 GDP 来看，

^① Brian Benjamin Crisher & Mark Souva, "Power at Sea: A Naval Power Dataset, 1865 - 2011,"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0, No. 4, 2014, pp. 602 - 629.

^② Geoffrey Bennett, *Naval Battl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 & Sword Military Classics, 2005), pp. 27 - 34.

德国在 1897 年至战前的 1913 年虽然一直落后于英国, 但仅存在些微的差距。^① 反观相关海军经费支出方面, 英国 1897 年总支出在 3000 万英镑左右, 之后就在欧洲大陆国家扩军的压力下快速增长, 到 1913 年时已近 5000 万英镑, 增长接近 1 倍。而有关海军支出过高的争论也在这一时期的政府和海军内部争论激烈。德国 1897 年海军相关总支出仅为 700 万英镑左右, 虽经逐年增长, 但即使在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已经如火如荼的 1913 年, 这项支出的总额也只有 2300 万英镑, 不到英国的一半, 与法、俄、美三国大体相当。^② 当然, 因为德国是一个传统陆权强国, 海军军费的比例在其总军费支出架构下要明显少于陆军。因此可以推知, 德国和英、法等国在战争准备时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大体相当。国防支出也许会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造成挤压, 但德国面临的压力并不比英、法等国来得更加沉重。在技术方面, 德国依靠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其海军后期建造的前无畏舰的动力系统和火力布局已经赶超了同期的英国前无畏舰。而在 1905 年后的无畏舰竞赛中, 德国战列舰的相关性能甚至还较英国战列舰具备了一定的优势, 这一点在一战中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中即可见一斑。综合来看, 德国海军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压力适中, 对新技术的应用比较及时, 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获得的效果相对较好。

第四, 从崛起国海军建设对其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看, 在德国开始海军建设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 英国并未将德国视为最主要的潜在敌人。在 19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英国海军最主要的竞争者是法国海军。但自从普法战争结束之后, 统一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新的陆权霸主, 也就同时成为英国大陆均势政策最主要的挑战者。如果此时德国海军维持近海防御的基本特征, 不大量建造进攻性舰艇, 那么英国的危机感或许还能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不过, 德国的选择是在已经拥有欧陆最强陆军的同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 194—196 页;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43—44 页。

②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 - 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 81 - 82.

时，进一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被触及核心战略优势的英国，此时只能放弃“光荣孤立”的国策，于1904年和1907年与法、俄两国结盟，对德国形成战略包围。^①而在海军运行战略层面，由于德国当时教条地遵循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理论，在海军法中明确指定英国为主要敌人，并拟将所有的主力舰集中在北海，针对英国的意味非常明显。受到这样的刺激，英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之中，英德关系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导致一战爆发。^②可以说，德国的海军跃进绝非英德爆发大战的唯一原因，但却起到了显著的加速器的作用。德国海军的发展不仅引发了海军军备竞赛，还恶化了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取得了较差的效果。

综上所述，1897—1918年德国的海军发展战略转型方向部分符合非对称的造舰结构特征，而与非对称的国内基础特征相符程度较高；而它的海军运行战略基本符合保守型海军运行战略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特征，并且与第二个特征相符程度较高。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德国海军建设的策略选择，在大部分指标上可以判断为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而在对海军建设效果的检验中，1897—1918年德国海军建设在硬件设施改善幅度与经济和技术两个层面部分，符合有关海军建设效果评估的正面描述；在力量投送、国家安全两个层面，高度符合效果评估的负面描述，海军建设遭遇战争打断并崛起失败。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德国海军建设的总体效果较差。

（三）1964—1985年苏联的海军建设

苏联海军崛起阶段的建设以1964年崇尚扩张军事力量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为开端，以1985年长期担任苏联海军司令的戈尔什科夫

^①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46—255页。

^②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第78—80页。

(Sergei Gorshkov) 被迫离职为终点。^①

首先, 我们考察苏联在这一轮海军建设所执行的战略选择。

在造舰计划的基本结构方面,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新的海上霸权国, 其海军军力也在美苏争霸的压力之下达到鼎盛。经过二战期间的实战检验, 战列舰最终走入历史, 航空母舰成为大国海军新一代的主力舰。所以美国海军在冷战时期的造舰计划, 主要是围绕航空母舰和喷气型舰载机的更新换代来进行, 主要建造了包括最后两代常规动力航母“佛瑞斯特”级 (Forrestal-Class) 和“小鹰”级 (Kitty Hawk-Class), 第一代核动力航母“企业”号 (USS Enterprise, CVN-65) 和美国海军主力核动力航母“尼米兹”级 (Nimitz-Class) 等在内的十多艘新航母。^②与此同时, 美国真正做到了舰队的多功能化和均衡化发展, 其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核潜艇的总数常年维持在 100 艘以上。反观苏联的造舰计划, 则基于现实需要, 强调提高苏联海军对美国航母编队的不对称打击能力。纵观苏联自 1964 年后 20 多年的海军建设, 其海军军备的重点始终放在发展核动力潜艇上, 其规模也超过了美国同期的核潜艇部队。^③而在水面舰艇建造方面, 苏联海军的着眼点也是放在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上, 甚至发展出了核动力巡洋舰这一现代海军史上特殊的舰种。

相对而言, 苏联对修建航母的态度就显得保守很多, 早期只发展出了具有浓重导弹巡洋舰色彩的直升机航母, 后期的航母设计依然保留了反舰

① 相比于两个案例有较为明显的历史事件作为海军建设崛起期的起讫点, 本案例的时间节点稍显模糊。之所以将 1964 年作为苏联海军建设的起点, 主要依据是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 苏联开始大幅修正其军事战略, 重新重视包括海军在内的常规武装力量的发展; 而将 1985 年为终点, 则是因为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裁军政策削弱了苏联海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而戈尔什科夫的离任则将这一趋势表面化了。王海、李植谷:《苏联军事战略概论》,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 第 50 页; 李彦明:《沉沦巨人: 俄罗斯》,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7, 第 147—148 页。

② 诺曼·诺尔马:《航空母舰 1946—2006: 航空母舰发展史及其对世界大事的影响》, 王华等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第 465—469 页。

③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 - 1993* (Seattle: 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 294 - 302.

导弹的火力设置。综合来看，虽然苏联海军在其海军建设末期开始追求与美国海军类似的均衡舰队目标，但在之前大部分的时间内，苏联海军执行的依然是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策略。

对与苏联海军建设相关的国内基础和民众意见进行讨论是一件模糊又困难的事情。由于苏联国内的政体制约，民众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机会对海军建设表达支持与否的意见。但如果考虑俄罗斯民族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扩张性战略文化，民众对将海军作为扩大国家权力边界的工具应当是可以接受的。^①但问题是，沙俄和后来苏联的扩张行为大多发生在陆地上，海军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沙俄还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遭遇过失败。因此，可以推测苏联民众和政府对于海洋虽有向往，但是想必也存在因为不熟悉、不了解而衍生的复杂情绪。另外，苏联海军建设的进程实际上受到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严重影响，而先后上台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对此的意见是差别极大的。并且，海军高级将领在苏共权力结构内部的地位并不高，戈尔什科夫也是依靠自己较高的政治智慧和与勃列日涅夫良好的个人关系来为苏联海军发展争取支持。虽不能说苏联海军建设的国内基础是内向型战略文化，但也没有证据证明领导层和民众在此问题上取得了有效共识。因此，在此方面可判定苏联海军发展战略转型符合所谓非对称的特征。

在海军运行战略转型方面，1964—1985年苏联海军所执行的战略逻辑和运行范围，基本上就是戈尔什科夫个人的意志体现，外加迎合勃列日涅夫对大型舰队的偏爱。戈尔什科夫常被人称为“红色马汉”，而他个人也不掩饰对海军进攻能力的偏爱，只不过因为要面对美国海军的巨大压力，戈尔什科夫的海军学说中有关“海上拒止”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具体分析苏联海军在这20年间的行为，不难看出其基于本土防御型的部署远少于之前，反而是在苏联整体“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下采取了很多“介入”色彩明显的军事行动，前文提到的美苏东地中海

① 曹静娴：《解析新时期俄罗斯战略文化》，《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8期，第76—78页。

对峙就是典型的例子。^① 而将核动力同时运用于潜艇和水面舰艇, 也显示苏联对于海军远洋巡航能力的重视与提升。由此可以判定, 这一阶段苏联的海军运行战略, 虽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也包含了“拒止”式的战略逻辑, 但更多实践中所遵循的还是“介入”式的战略逻辑和跨海域的运行范围。

虽然苏联与东欧主要盟国之间的交通并不依赖海洋, 但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苏联必须通过海洋来同美国竞争全球影响力。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苏联海军黑海舰队在地中海的势力扩张, 成功突破了土耳其海峡的限制, 形成了在东地中海的稳定存在。这一过程并非以破坏美国海上交通线的形式来达成, 而是建设苏联自己的海上战略通道, 与美国竞争性地共同利用同一片海域。另外, 凭借苏联本身已经建立的国际影响力, 苏联海军成功地在一些与苏联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获得了地理位置优越的海军基地, 其中又以埃及和古巴两地的基地最具战略价值。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例子外, 苏联还在 1979 年与越南签署协议, 获得了金兰湾的租借权, 有效地扩大了海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鉴于以上这些史实, 基本上可以判定, 这一阶段苏联的海军运行战略, 对于制海权的利用更侧重于建设性意义。

在核威慑存在的前提之下, 美苏两国之间的直接对抗才会以“冷战”的形式存在。具体到海军领域, 形式多样的对外展示实力行为成了最常见也最有效的美苏对抗形式。前文提到的 1973 年 10 月发生的苏联海军在东地中海对美国所采取的威慑性行为, 被认为是苏联海军压制美国气焰、赢得盟国信任的成功海军外交尝试。^② 而苏联海军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全球性海军演习, 也有效地展示了自身军力, 向自己的盟国以及美国的盟友传递了含义不同的军事信号和政治信号。此外, 苏联在海军合作外交领域也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1972 年 5 月, 苏联同美国在莫斯科

① 代鹏:《龙战于野:后冷战时代的霸权与战略较量》(之四),《舰船知识》2014 年第 4 期,第 81—87 页。

② 张启良:《海军外交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第 50—52 页。

签署了防止苏美海军发生意外摩擦的协定，对事实上处在对峙状态中的两国海军的行为做出了很多限制性规定，并建立了制度化的对话管道和危机处理机制。^① 这一协定及其相关议定书的签署，是二战之后大国海军建立信任措施的一种新尝试，也开创了之后各大国处理海军事务的新模式。由此可以判定，这一阶段苏联的海军运行战略，主张对外进行高频度与多形式的对外展示实力行为，规避了战争风险，强化了盟国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考察基于以上战略选择的苏联海军建设的具体效果。

第一，从崛起国海军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看，苏联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共有超过 1000 艘各式舰艇在战争过程中沉没。^② 战后斯大林虽然想要重启大型造舰计划，但由于他个人理念落后，加上技术和资金的限制，苏联海军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只是一支拥有数十艘老式巡洋舰和驱逐舰，加上数量庞大的小型舰艇的“蚊子舰队”。其继任者赫鲁晓夫又把国家军事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战略火箭部队身上，得不到有效支持的海军依然只是一支近海防御型海军。而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苏联海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经拥有了近 150 艘各类型的核动力潜艇、超过 100 艘具备导弹发射能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海军航空兵也拥有 1400 多架飞机，舰队总吨位达到美国海军的 3/4，是第三名英国海军的 5 倍之多。^③ 虽然此时的苏联海军舰队中依然充斥着大量只能近岸活动的小型舰艇，航空母舰的建造也一直处于相对迟滞的状态，但是苏联海军的造舰计划所取得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给美国海军造成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苏联海军在硬件设备改善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提升巨大，其实力建设

①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Prevention of Incidents On and Over the High Seas”,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sov008.asp; 季晓丹、王维：《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及发展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 年 3 月，第 69—84 页。

② 吴荣华：《二战苏联海军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第 430—431 页。

③ 孟胜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海军建设》，《黑龙江史志》2011 年第 21 期，第 32—34 页。

在此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从崛起国海军在力量投送与海上运输方面的能力看:苏联海军之所以被苏联领导人加以重视并在 1964 年开始建设,直接原因就是苏联海军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暴露出了其力量投送和远航能力上的严重不足。当时的苏联海军甚至没有一艘大型水面舰艇可以承担到达加勒比海的远航任务。再加上当时苏联缺乏足够的海外军事基地,所以在之后的海军发展中,苏联也特别重视舰队的远洋续航能力。大量核动力潜艇的建造,“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这一特殊舰种的开发,就显示出苏联海军在这一方面近乎偏执的追求。巨大的投入带来丰厚的产出,在历次全球性军事演习中,苏联海军都展示了其水面舰队可以轻易从北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个方向突入北大西洋的能力。并且,随着海外基地数量的增加,苏联海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经具备了在所有大洋上执行战略战术任务的能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远洋海军。并且其军舰上大多配置了数量众多的导弹发射器,对岸攻击的能力其实也不逊于以舰载机为主要武器的美国海军。因此,苏联海军作为二战之后第二支可以做到全球部署的海军,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效果良好。

第三,从崛起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看,作为世界当时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苏联经济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其发达的重工业体系依然帮助它在二战之后获得了较快的恢复。1964 年苏联的 GDP 大约相当于美国的 45%。^① 但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生产增长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明显放缓,到了 70 年代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的状态。^② 为了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平衡,苏联的军费投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一直很高,常年保持在 30% 以上。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期,军费年增长率都保持在 10% 左右,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军费总额更是在很多年份高

①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 84—85、100—101 页。

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 422—425 页。

于美国。^① 很多学者也认为，苏联事实上是在以牺牲本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为代价，来勉强争得在同美国军事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其中，苏联海军军费在军费总额的占比为 15%—20%，与空军大致相等，远低于陆军，份额虽不高，但显然也是压垮苏联经济重担中的一部分。而在技术转化领域，苏联的投入不可谓不巨大，其军费的 1/4 是用于军事技术的研发工作，涉军研究的科研经费占国家总体科研支出的比例近 75%。也正是由于苏联军工科研系统的强大支持，苏联海军才能在短短 20 年内完成整个舰队的更新换代，并在包括核潜艇和巡洋舰等相关技术方面比肩，甚至超过美国。不过受限于战略思维，苏联海军在航母及其舰载机的研发领域步伐较慢，甚至犯过方向性错误。综合来看，苏联海军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压力极其沉重，对新技术的应用尚属合格，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获得的效果相对较差。

第四，从崛起国海军建设对其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看，在这方面苏联与美、德案例不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苏联在东欧和亚、非拥有为数不少的盟友，周边安全环境的基础是优于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德国的；另一方面，“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是明确的军事竞争和对抗关系，只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抑制了双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因此，苏联发展海军并没有对美苏争霸的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只是增加了一个双方竞争的新领域。如果从细节观察，随着海军的壮大，苏联的近海防御形势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其对外政策执行也有了新的抓手。不过，美苏海军之间直接对抗机会的增加也使得两国之间的战争风险升高，比如在 1973 年的事件中，美苏舰队就险些开战，美国还因此宣布了全国核戒备。苏联海军的发展是在军事竞赛的背景之下，但客观上保护了国家安全，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的效果为中性。

综上所述，1964—1985 年苏联的海军发展战略转型方向基本符合非

^① 李卫国：《苏联的军费开支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 年第 9 期，第 39—44 页；谢·罗戈夫：《苏美军费比较：均势的代价》，《世界经济评论》1991 年第 10 期，第 63—69 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 377—379 页。

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的两个基本特征；它的海军运行战略转型方向则高度符合开放型海军战略全部三个基本特征。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苏联海军建设的策略选择，在大部分指标上可以判断为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而在海军建设效果的检验中，1964—1985 年苏联海军建设在硬件设备改善幅度、力量投送层面，符合有关海军建设效果评估的正面描述；在经济与技术两个层面符合效果评估的负面描述；在国家安全层面的评估则呈现相对中性。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苏联海军建设的总体效果较好，虽不及一战前美国海军建设的案例，但优于德国的案例。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验分析结论

本文对崛起国发展海军实力时的策略选择及其效果进行研究，进而在国家分析层面构建了解释和理解崛起国海军建设成败的新的理论假说。本文通过描述现代海军时代崛起国试图挑战海上霸权国而发展海军力量的大体过程，以找出影响不同崛起国海军建设效果的共同决定性因素。笔者首先对本文涉及的主要自变量海军发展战略、海军运行战略和因变量海军建设效果进行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接着，笔者选取了 1889—1918 年的美国、1897—1918 年的德国以及 1964—1985 年的苏联这三个不同选项组合也收到不同效果的具体案例，来对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的策略选择和海军建设效果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检验，三个案例的检验情况详见表 2。

假设 1：当崛起国执行一定的海军发展战略时，选择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的海军建设效果，要优于选择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可以使崛起国的海军具有更大可能崛起成功。笔者通过 1889—1918 年美国海军建设与 1897—1918 年德国海军建设的案例对比检验获得了证实，假设可以成立。

表 2 对假设案例的检验总结

假设内容	对应案例	变量情况	是否证实假设
假设 1: 海军发展战略一定时选择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 其效果优于保守的战略选项	1889—1918 年美国海军建设 1897—1918 年德国海军建设	自变量: 美国对称加开放; 德国对称加保守 因变量: 美国海军崛起成功; 德国海军崛起失败	假设成立
假设 2: 海军运行战略一定时选择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 其效果优于非对称的战略选项	1889—1918 年美国海军建设 1964—1985 年苏联海军建设	自变量: 美国对称加开放; 苏联非对称加开放 因变量: 美国海军崛起成功; 苏联海军发展相对成功	假设成立
假设 3: 四种可能的战略组合中, 对称加开放的战略选择效果最优; 非对称加保守的选择效果最差; 其他两种选择效果介于二者之间	本文三个崛起国海军建设案例比较检验	自变量: 美国对称加开放; 苏联非对称加开放德国对称加保守 因变量: 美国海军崛起成功; 苏联海军发展相对成功; 德国海军崛起失败	假设基本成立

假设 2: 当崛起国执行一定的海军运行战略时, 选择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选项的海军建设的效果, 要优于选择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 可以使崛起国海军具有更大可能性崛起成功。通过 1889—1918 年美国海军建设与 1964—1985 年苏联海军建设的案例对比检验获得了证实, 假设可以成立。

假设 3: 根据前两个假设, 当崛起国执行开放加对称的战略组合时, 海军建设效果最好; 当崛起国执行保守加非对称的战略组合时, 效果最差; 而开放加非对称或者保守加对称的战略组合所导致的崛起国海军建设效果可能居于中间。本文对三个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案例进行对比检验, 获得了大部分证实, 又由于缺乏非对称加保守战略选择的历史案例, 所以本假设基本成立。

综上所述, 本文研究发现崛起国在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两个方面的策略选择组合, 共同决定了崛起国快速提升海军实力的努力能否获得良好效果和持续性的成功。其中, 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选项加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选项对崛起国来说是相对优选, 可以令海军建设的效果较好, 并且拥有很高可能性实现海军的成功崛起。如果将两个方面的策略选择单独分析, 可以发现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总是优于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 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也较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优势。

表 3 对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案例检验		1889—1918 年 美国的海军建设	1897—1918 年 德国的海军建设	1964—1985 年 苏联的海军建设
海军建设 策略选择	造舰计划的结构	以战列舰为主体	以战列舰为主体	发展核潜艇、反 舰导弹
	国内基础与民意	外向型文化 民众支持	陆军传统强 民众支持不足	扩张型文化 领导意志善变
	战略逻辑与运行范围	全面介入,两洋部署	风险理论,形攻实防	部分拒止,总体 介入
	制海权运用	保护航线 广布海外基地	制海欲望低 战时袭商破交	全球扩张 争取海外基地
	对外展示实力的形式 和频率	炮舰政策、高频多样	炮舰政策、效果有限	与美信任外交 全球演习高频
	总评	对称加开放	对称加保守	非对称加开放
海军建设 效果评估	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	绝对与相对 实力上升明显	绝对与相对 实力上升明显	总吨位上升 拉近与美差距
	力量投送与远洋续航 能力	远洋续航力强 执行任务多样	投送能力差 对外投送案例少	续航能力提升 全球部署形成
	经济与技术因素与海 军的互动	经济支持有力 技术转化充分	经济压力适中 技术转化及时	扩军反噬经济 部分技转迟滞
	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 环境	未遇明显制衡 周边稳定	扩军加剧制衡 最终引发大战	外部安全压力 持续高位
	总评	成功崛起	崛起失败	发展迅速,相对 成功

(二) 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选项组合产生效果的原因

为什么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的选项组合会相较于其各自的竞争性策略选项组合更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崛起国海军建设的目标是为了缩小与海上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并至少建立区域性的海上力量优势和主导权,而对称加开放型的策略选项组合最符合历史既有海上霸权国的海军特征。在现代海军时代,只存

在英国和美国两个海上霸权国，而英、美海军所秉持的海军建设路线，都是对称加开放的策略选择。特别是美国海军，它自 1889 年开始进行海军建设起，其海军形态就一直是以大型进攻性水面舰船为主的舰队，加上遍及全球各个大洋的军事存在和前进基地。而在风帆时代，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都曾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取得过海上霸权，而维系这样的霸权也是靠广泛分布的殖民地和大量的海军舰船。^① 虽然在一些特征指标上会有所变化，但是两个时代海上霸权的基本形态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崛起国来说，如果海军建设可以取得成功，则其最终的海军形态大抵也不会脱离历史规律。又因为海军一直是一支高资本与高技术密集的军种，替代性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物质成本相当高昂。^② 因此采取跟随仿效的方式，选择对称加开放的策略组合，对崛起国来说是相对优解。

其次，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是一种透明度较高的造舰计划，可以有效降低霸权国的不安全感和警惕性。虽然人们熟知的军备竞赛往往是以崛起国与霸权国争相修建主力舰为特征，但是修建主力舰在此处仅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谓两国间的敌对关系和国内政治因素还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修建大型水面舰船并不必然导致海军军备竞赛和霸权国其他制衡行为的发生。^③ 相反，非对称型的海军发展战略，即修建在战术层面明显克制霸权国主力战舰的替代性战舰，对霸权国所传达出的敌意才更加明确。另外，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也会面临所谓“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问题，因为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虽然可以保持

① 有关风帆时代霸权国的海军历史参考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1), pp. 45 - 140;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 52—135 页; 刘中民:《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08 年第 5 期,第 69—78 页。

② Norman Friedman:《海权与战略》,翟文中文译,台北桃园县,“国防”大学译印,2012,第 63—64 页。

③ Ido Oren, “Capability and Hostile Behavior in Arms Race Model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1, No. 4, June, 1996, pp. 309 - 334; Sean Bolks and Richard J. Stoll, “The Arms Acquisition Process: The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Arms Race Dynamic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5, 2000, pp. 580 - 603.

较好的保密程度,但霸权国很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信息来源而做出过激反应。^①最后,崛起国海军在其起飞阶段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具有一定战略灵活性,即可以选择是否明确以达到和超越霸权国的海军军备水平为目标。如果崛起国选择的目标仅仅是接近而非超越霸权国,那么引发军备竞赛和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有可能促成与霸权国的对话和妥协。^②

再次,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现有海上秩序的承认和维护,直接挑战霸权国的意味相对较淡。海军存在的主要目标是维系海上控制或者制海权,以确保本方可以自由使用海上通道。有关制海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的争议一直在进行,但随着战略理论的丰富和海军技术的革新,相对性和暂时性的海洋控制概念逐渐被各国所认同。开放型和保守型两类海军战略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专注制海权的建设性运用,后者专注破坏性运用。虽然崛起国采取开放型的海军战略也存在挤压和占据原有霸权国海上势力范围的可能,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崛起国在海军建设期间是认同霸权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海上霸权的,前者所要求的往往只是一定区域内的主导权。相反,保守型的海军运行战略的破坏性基本等同于直接对抗霸权国所建立的海上秩序,这是霸权国难以接受的。并且,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海军行为的模糊性和机动性,扩大了崛起国海军的影响力,也提高了霸权国在非战争状态下的制衡成本。^③

最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相关国际制度的逐步健全和核威慑体系的建立,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转化为一超多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也没有增加。由于霸权国制衡强度的降低和制衡成本的相对提

① Sandeep Baliga and Tomas Sjöström,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Arms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6, No. 6, December, 2008, pp. 1023 - 1057.

② 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39—244页。

③ Norman Friedman:《海权与战略》,第65—66页。

高，海军实力崛起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减小。^① 在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低的前提下，大国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已经转为同小国进行利益分享。如果一个崛起国仅仅提升自身实力而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或不向国际社会提供一定量的公共产品，其实力越增长，遭遇的体系压力就会越大。^② 回归到海军建设的层面，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显然要比保守型的海军运行战略更容易为他国提供好处，并纾解自身的体系压力。^③ 在此条件下，崛起国采取一步到位的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在时间和资源成本上都会变得更加合算。综上所述，当下国际政治格局和海军技术发展的新变化实际上加强了本文基本假设对可预期的未来崛起国海军建设的解释力，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作为相对优选的地位也会进一步凸显。

（三）对中国海军建设的政策含义

本文所提出的有关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战略选择理论，适用于崛起国海军发展的崛起阶段，而这一崛起阶段通常是发生在崛起国整体崛起过程的中后期。因此，这一理论如果成立，则其也对中国整体崛起过程中后期时的海军发展具有政策上的参考意义。

在海军发展战略的策略选择上，笔者认为中国海军首先应遵循从修建

① 以当下的中美海军关系为例，面对中国海军军力的上升，美国所采取的策略实质上是在希望遏制与接触之间求得平衡，或者实现中美海军在一些具体领域的谅解与合作，这与之之前崛起国与海上霸权国的互动模式明显不同。樊吉社、张帆：《美国军事：冷战后的战略调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10—332页；庄建中：《中国海洋发展战略与中美合作》；彼得·A. 达顿：《指引航向：中美海军开展合作，促进治理与安全》；迈克尔·J. 格林：《美中海上合作：地区影响与展望》，引自安德鲁·埃里克森、莱尔·戈尔茨坦等主编《中国、美国与21世纪海权》，第19—25、166—194、281—288页。

② 相关研究参考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③ 相关分析参考 Colin S. Gray, *The Navy in the Post - Cold War World: The Uses and Value of Strategic Sea Power* (University Park, P. 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5 - 160。

“辽宁”号航母开始的既有路线,实施在结构上与美国基本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中国海军的造舰计划,应该参考美国海军现有的舰队结构,将重点放在继续建造以航空母舰为主体的具有远洋进攻能力的大型舰队方面,尤其应发展核动力航母。

其次,政府还应采取措施,营造支持中国海军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特别是要加强对各级在校学生的海洋教育和海军教育。海军建设是一个需要调动大量社会资源的综合性工程,海军发展是一类极易引发社会关注的公共议题,没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一个积极的舆论环境,海军要实现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海军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工程人才,海军也需要大量掌握专业技能的军事人员,因此扩大人才的选材范围和提升海军对民众的吸引力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而以上所有这些要求,都应在每个人的求学阶段和孩童时代就落实最基本的教育理念。

相对于海军发展战略的策略选择,中国在海军运行战略上的策略选择则更与整个国家对外政策与相对实力上的变化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新基调,并开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轴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扩大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军理应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使命。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国的海军建设应选择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具体来说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注意。

第一,中国海军未来对制海权的利用要注重建设性意义,特别是要大力争取舰队在非近海区域稳定的存在。中国海军要提高自己的远洋行动能力,特别是保卫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海上交通线的能力,那么寻找形式适当、布局合理、数量合宜的海外基地势在必行。考虑到目前中国政府仍然秉持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获得海外军事基地在政策层面具有较高的困难度和敏感性。这里可以借鉴所谓“战略支点”的概念,^①利用军民两用或其

^① 相关讨论和学者观点参考徐进、高程、李巍、胡芳欣《打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支点”国家》,《世界知识》2014年第15期,第14—23页。

他相对宽泛的概念与目标国达成谅解和共识，扩大中国海军在对方港口的相关权限（尤其是具有部分排他性的优先权限），逐步接近一个完整海军基地的用途需求。而在地点的选择上，中国海军对马六甲海峡附近和印度洋沿岸应当予以优先考虑。

第二，中国海军未来应进行高频度与多形式的对外实力展示，着力拓展海军外交职能。中国应关注海军建设和舰队存在所派生出的政治意义，更应该重视和推动中国海军发展多形式多任务的对外实力展示的职能。对中国来说，强化海军的对外实力展示至少有三个不同层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将海军军事存在的意义外延至政策工具，丰富中国贯彻本国外交政策和意图的手段；其次，建构中国海军与外国海军基本的双边或多边信任措施，并提高与友军联合行动的效用；最后，提高实力快速上升期的中国海军的透明度，打造中国海军的软实力，改善中国海军的对外形象。^①

第三，基于有效规避制衡的战略意图，中国海军未来的发展应明确近期与中期目标，争取国际空间，进而争取与美国及周边国家达成谅解和共识。笔者认为，在中国海军发展的崛起阶段，务必要保持战略目标的有限化，绝不应直接挑战美国目前依然稳固的全球性海上霸权。作为本地区经济总量最大、军事实力较强的国家，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和作用理应得到提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纳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未来，中国海军不仅应当承担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责任，更应当努力寻找机会，为本地区的海上安全秩序提供积极的安全保障。^②

① 参考张启良《海军外交论》，第233—236页。该书为中国学术界第一本全面论述海军外交的学术著作，相较于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的系统性研究，中国学术界对此议题的关注还明显不足，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海军在外交领域的潜力远未被完全发掘。

② 笔者此观点主要受下列几篇论文的启发，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7页；孙学峰：《寻求中国东亚政策的再平衡》，《东方早报》，2014年1月14日，第A11版。